國際外交與台灣前途

●羅福全／前駐日代表

●陳雪琴記錄整理

初中時期，蔡同榮博士雖然就讀台南一中，而我是嘉義中學，但我們很早就認識。有趣的是，後來他高中跑去讀嘉義中學，我則選擇台南一中就讀。在我的印象當中，蔡同榮博士在學生時期，即展露不同於一般人的個人特質，他擅長於組織規劃，也非常關心政治。

召開關仔嶺會議 矢志對抗中國國民黨

在大學時代，蔡同榮博士是對抗中國國民黨的先鋒。他很早就看不慣中國國民黨惡劣的本質，就讀台大期間，參與代聯會主席的選舉，當時中國國民黨的競選對手，以為代聯會的選舉是穩操勝券，沒想到蔡同榮博士出人意料以一票之差當選。當選台大代聯會主席後，蔡同榮一再受到中國國民黨的高壓控制，致使蔡同榮對中國國民黨的不滿，埋下了日後與中國國民黨邪惡勢力對抗的因子。

蔡同榮博士具有超人一等的組織能力，在大學畢業後、赴美留學之前，透過台大與嘉中、南一中等同窗關係，1960年6月19日召開「關仔嶺會議」，四十三位志同道合者在台南關仔嶺溫泉旅館秘密集會作伙結拜。這是他出國前的最後一次集會。

關仔嶺會議結束後，蔡同榮博士9月19日前往美國前，差一點無法成行，另一位同行的劉家順（台中一中保送台大政治系），護照卻被警備總部註銷，幸好當時蔡博士已經出國。後來才知道關仔嶺會議消息外露，侯榮邦等人被特務抓去問話，劉家順則不幸被逮捕並判刑入獄。

1960年8月我先到日本留學，1963年8月轉往費城（Philadelphia）修讀博士學位時，路過洛杉磯（Los Angeles）與蔡同榮博士見面，他告訴我費城是全美台獨運動的中心，希望我到那邊之後能夠有所作為，居間整合在美國的台獨運動。為此，我們一直保持密切的聯繫，另外，參與關仔嶺會議的兩位優秀青年林啟旭與侯榮邦，他們離開台灣到日本留學之後，也積極參與日本「台灣青年社」的運作，推動海外的台獨運動。在關仔嶺會議之後，我們都保持聯繫，林啟旭與侯榮邦兩位在日本，而蔡同榮、張燦鑅、陳榮成以及我四位在美國，雙邊密切的聯繫當中，促成了海外台獨運動的整合。

居間協調 促成台灣獨立建國聯盟

在海外時期，蔡同榮博士是居間協調整合台獨運動、創立台灣人公共事務會的推手。1960年代台灣留學美國的人數，年年都有相當數量的成長，當時全美有三十二個校園內相繼成立台灣同鄉會。蔡同榮博士希望以散佈各地的台灣同鄉會，作為組織未來擴大發展的基礎，1966年我們首先在費城成立「全美台灣獨立聯盟」（The United Formosans in America for Independence，簡稱UFAI），隨後我們再以此為主體，繼續與在日本的「台灣青年社」展開更密切的合作，隨後又串聯加拿大「台灣人權委員會」與歐洲「台灣獨立聯盟」等台獨團體。最後，終於促成1970年世界性的「台灣獨立聯盟」（World United Formosans for Independence，簡稱WUFI）在紐約（New York）成立，蔡同榮博士被推舉為台灣獨立聯盟的首任主席。

此外，1960年代在海外的台灣留學生經濟條件普遍不佳，一開始我向蔡同榮博士提出建議，洛杉磯有四百名台灣人，只要每一個人都捐出一美元，我們就有四百美元的收入；費城則有兩百名台灣人，每一個人也捐出一美元，總計可收到兩百美元，這些小小的資金集合起來，可以作為台灣獨立聯盟運作的基金。1980年代以後，台灣人移民美國的數量愈來愈多，碰巧當時民主黨的甘迺迪（Edward Kennedy）有意參選總統，我們在洛杉磯為他舉辦一場千人的助選餐會，每一位與會者出資一百美元，為甘迺迪募得十萬美元競選總統的資金。甘迺迪非常感激台灣人的支持，幫台灣人積極爭取移民美國的配額，並促成美國國會通過中國移民配額兩萬名，台灣移民的配額也是兩萬名的決議。蔡同榮博士注意到透過支援美國政治家的選舉，讓他們來幫助台灣事務的重要性，於是爭取包括：彭明敏、王育德、郭雨新、郭榮桔、陳唐山、王桂榮等海外重要台灣人社團負責人的支持，促成1982年「台灣人公共事務會」（Formosan Association for Public Affairs，簡稱FAPA）的成立，由蔡同榮擔任FAPA的首任會長。

促成台灣人公共事務會 對美國會展開聯繫遊說

FAPA成立的主要任務是對美國參眾兩院展開聯繫遊說，拓展美國國會與國際社會對台灣民主發展基本人權的關注。蔡同榮博士擔任FAPA會長，我們一起到國會拜訪索拉茲（Stephen J. Solarz）眾議員，當時索拉茲擔任眾議院亞太小組主席。我們積極向他遊說，除了提供亞洲國家人權及政治的相關重要參考資料，並不斷重申台灣與中國是不同的國家。一年之後我們收到索拉茲眾議員的來信，表示感謝我們提供他不少重要的資訊，讓他擔任眾議院亞太小組主席期間有非常好的表現。

此外，蔡博士領導下的FAPA，1983年曾向來自羅德島州（Rhode Island）的裴爾（Claiborne Pell）參議員遊說，希望他協助在國會推動「台灣前途決議案」，該議案強調台灣的前途要由當時的一千八百萬台灣人民來決定。在國會的聽證會上，我受邀擔任台灣人的代表作證外，另有美國的政府官員列席備詢。最後，參議院外交委員會投票通

過該法案，並在參議院通過「台灣前途決議案」。當時陳唐山委員繼蔡博士擔任FAPA會長，參與此項活動。

相較於蔡同榮博士擔任FAPA會長時間，積極在美國國會爭取台灣人民的福祉，反觀馬英九2008年競選總統期間，在台灣四大主要報紙上登載半頁的廣告，提出台灣的前途要由兩千三百萬台灣人民來決定的主張。但是，馬英九一當上總統的所作所為，並未實踐他的競選承諾，並使台灣主權受到中國威脅，非常不應該。

回台推動公投立法與加入聯合國

1990年代台灣開始推動政治民主化，蔡同榮博士迫不及待回台，投入推動民主改革的大工程。蔡同榮博士認為公民投票決定公共事務與住民自決是世界潮流，與台灣未來的發展息息相關。為此，他積極推動公投立法，一方面向政府施加壓力，逼迫政府推動改革，進行民主深化；另一方面，藉此機會散播主權在民的理念，營造公投民主的發展環境。同時，提出公投加入聯合國作為未來努力的方向。

總結而言，蔡同榮博士一生是一段為台灣的民主、自由與人權打拚的過程。從大學時代開始，蔡同榮博士勇敢對抗獨裁統治；在海外時期，蔡同榮博士居間串聯擴大海外台獨團體的力量，催生台灣人公共事務會，對美國國會展開遊說，爭取台灣人民的基本人權；最後，台灣進入民主化的進程，他更迫不及待回到故鄉推動公投立法、人民自決、公民投票加入聯合國。

檢視這次「318太陽花學運」的表現，其中主要的學生領袖一再提及主權在民，強調台灣的前途應由二千三百萬台灣人民來決定，這就是一個民主國家最基本的要素。當前民主先進國家的重要政策，都是交由人民作主來決定，但是中國共產黨或是中國國民黨卻不是這麼想，他們所想的是利用民族主義來束縛民意，一百年來實行一黨專政。

由此觀之，同榮兄是台灣一位非常傑出的政治家，他的一生歷經台灣不同的時代，不變堅持民主與自由的理念，始終站在「顧台灣」政治運動的第一線；此外，我們也看到他傑出的領導能力，一旦設定目標，絕對全力以赴，不論是國際外交、對美國國會的聯繫遊說或推動公投，都可看見他的貢獻。這些都是他留給台灣最大的遺產，著實不易。◆